



校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校长的 特殊使命

XIAOZHANG DE TESHU SHIMING

胡百良◎著

这是一本写我做中学校长工作的书

这是一本写我一辈子为之追求的教育理想的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

校长的特殊使命

校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胡百良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杨晓琳
版式设计 尹明好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长的特殊使命:校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胡百良
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7
ISBN 7-5041-3428-7

I. 校... II. 胡... III. 中小学—校长—学校管理
—研究 IV. G6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728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593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40 千

定 价 25.00 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 001 - 2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
献给
我的恩师江山野先生



作者简介

胡百良，1934年6月出生於江苏省无锡市。1953年11月参加教育工作。1963年7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业余大学。1984年被评为江苏省物理特级教师。原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校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1989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江苏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现为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1996—2002年担任南京实验学校校长，2002—2005年担任南京师大附中江宁分校顾问。50多年来，致力于中学物理教学和中学行政管理的实践与研究。撰写教育论著共计200多万字，公开发表了130多篇教育论文，应邀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做过200多次专题报告。1994年5月，由南京电教馆录制《胡百良物理教学研究集锦》（共11集）。1998年4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学物理教学实践与研究》，并在1999年12月获南京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8月，《胡百良教育文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前 言

这是一本写我做中学校长工作的书，这是一本写我一辈子为之追求的教育理想的书。

回忆起来，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老师，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校长。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数。

1941—1947年，我就读于无锡连元街小学，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桃坞中学初中。1949年2月初二下学期又转入无锡辅仁中学，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7月初中毕业，考进了当时的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1953年7月毕业，志愿当医生，但体检查出我有肺结核，剥夺了我报考大学的资格，只好回家休养。11月，应学校邀请，回母校代课教初二物理，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大学。195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服从组织决定，正式留校工作，从此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与青年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作后历任初高中物理教师、班主任、校团委书记、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等职务。“文革”中受到了冲击。1975年8月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7月更名为副校长。1980年老校长退休，领导希望我接替校长职务，我不愿意，软顶到1984年6月，组织做了决定，只好服从。1988年，听说要调我到市教育局工作，我有自知之明，不是当官的料，不愿意离开教育第一线，“说服”了领导，从候选人中除了名。1994年退休后，先后又担任了三所民办学校的校长。

算起来，至今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52个年头了，做了近30年的校长。做校长，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有解决不完的矛盾，校长工作本身就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我这一生最大的体会是：一个人一生做什么，常常是很偶然的，并不一定都是自己本来的愿望，但是，能够服从客观的需要，坚持正确的人生目标，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惜为之付出毕生精力，执著地追求，不懈地探索，有所创造，就一定能为人民和社会做出自己的那份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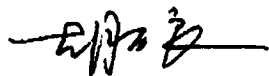
就我的认识，办好一所学校，有这样8个基本要素：（1）办学目标；（2）教育教学；（3）行政管理；（4）教育科研；（5）教师队伍；（6）校园建设；（7）校园经济；（8）领导班子。校长对学校的行政工作，负有第一

位的责任，具有特殊的使命。本书围绕“校长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这个主题，仅就我的教育实践与研究中，最有体会的若干问题，做了重点介绍，并未求全。应该说，各章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校长自身没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就不可能有对学校一系列管理目标的科学确定；如果没有对基础教育根本任务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课程改革的实践；如果没有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思考，就不会有对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的要求。总之，一个校长如果没有确立理想教育的目标，也就不会有追求理想教育的行为。但是，各章又是相互独立的，并没有紧密的上下联系。

这次出版前，对原书稿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我希望能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实在的校长形象，书中不仅集中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还附有大量在这段时期内学校改革实践的原始资料，这些都是我亲自所写，或是在我主持下制定的，凝聚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数十年的心血，具体体现了我们的办学理念与实践的结合，行与言的统一，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参考价值。在书稿的写作形式上，也想做一次尝试。

我尊敬的师辈江山野先生，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过去曾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教诲，这次又专门为本书写了评论性文章，这是他2001年生病住院期间写下的“关门篇”，后得知他于2003年1月病故，心中非常难过，现在特将此文作为本书的“代序”，并愿以此书，谨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思念。

生命有限，事业无限。一个人的实践和认识，总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个人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还会有错误，所宝贵的是其真实性。我这里所写下的，并不认为它们都是绝对正确的，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可供后人讨论和借鉴。我只是希望本书能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一个例证，若能如愿，那就达到我写作的初衷了。



2005.12 于南京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 改革事业的校长——胡百良

——代 序

应当说在前面的话

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写这篇文章，我想，首先应当“坦白交待一下我和胡百良同志的关系”，以便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一些“背景”，对我所写的做出自己的客观分析和判断。

平时，因为工作关系，我常称胡百良同志为胡校长，但在这里我要称他为同志，因为我们两个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同志。我们不仅都是共产党员，也不仅多年在一起从事共同的教育改革研究，而且有着共同的教育改革思想和志向。如果用一句成语来说，那就是：志同道合。

我们两个已相识相处十多年，在一起开过很多次的研讨会，又一起到国外去考察，住在同一个房间，同吃一锅饭。我也多次到过他当校长时的南京师大附中和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两所私立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一个志同道合、友情深厚的人和他的书写分析研究的文章，这就不仅是可能而且必然会带有宣扬他的思想和事迹，宣扬我们共同的观点，以至宣扬我自己的思想的色彩。不，不只是带有这样的色彩，而且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完全是这样一种宣扬。其实，除了虚言假话之外，天下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宣扬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同的思想观点，或者是抒发自己的感情。不过，宣扬与吹嘘不同。宣扬有的可能带有吹嘘的成分，甚至完全是吹嘘，宣扬也可能毫无吹嘘之处。这就要请读者自己判断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观点，也总会有些差别。在志同道合的同志中间，这也是很自然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和胡百良同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只是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事业的校长——胡百良

一个研究工作者，尽管研究也要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相结合，但最后也只能是通过研究提出一些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建议或设想，换句话说，也就是只能“纸上谈兵”，而“纸上谈兵”，理想的成分就可能更大一些；他则主要是一个实践家，他也进行研究，但却是从实践出发来进行研究，然后还要将从研究中得出的认识和设想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样，他就胜我一筹，比我实际，比我深入，也比我要多费很多工夫，干起来要比我仅仅是“纸上谈兵”困难得多了。

再一个区别是：我已年近八旬，几年前已经退出了教育论坛，不再参与教育改革的研究，除非有特殊原因，也已不再想写什么有关教育的文章了；而他从南京师大附中退休以后却一直在干，并且一直在当校长。这个区别，也很大。

现在，我既不承担任何研究课题，也不负什么工作责任，很“超脱”，以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旁观者”的地位，但是思考却并没有停止，很自然还常常会想到一些教育问题。不过，因为已经不“身在其中”，看问题的角度也就有所不同了。这就使我不禁联想起苏轼的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这首诗含有深刻的哲理，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但却只说了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讲，还应当说“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需深入此山中”。这样就全面了。不过，诗毕竟是诗，不是哲学论文，能够别开生面，做到使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就很不得了了。

借用这首诗的比喻，现在的情况是，胡百良同志还在“山中”，我却从“山中”到了“山外”，因而也就有了些山外的看法。“山中”和“山外”的看法，自然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矛盾，更不会是对立的，而是正好可以互补，可以相辅相成。这就要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胡百良同志在这本书中首先谈到的一个问题。

一个遍及全国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潮流

胡百良同志在他这本《校长的特殊使命》一书中，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个困扰我国教育多年的重大问题。

他说：“现在的中国学生，特别是那些想考上大学的学生，从小学就掉进了无边的苦海，是当今世界同龄人中学得最苦的一代。”

他说：“我曾调查过，高三学生一般每天要学习15个小时以上，平时他们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没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很少看电视，很难有

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学业负担重，思想包袱重。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他又说：“现在中国的学生从小就为考分而学习；在世界上学习负担是最重的，而厌学情绪也是最重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磨灭了，这是教育的最大失败。这种教育制度，如何能兴国？”

他也肯定，学习本来也有艰苦的一面，但却应该是有苦有乐，苦乐相随，而“严重的问题是，现在的学生，苦得被动，苦得包袱沉重，苦得影响他们德智体的和谐发展，苦得无自己的兴趣爱好，苦得无个性特长，苦中无乐，甚至厌学……”

他还做过很多调查研究，揭示了这种教育的很多弊端，对这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完全违反教育规律的，对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危害，并为之深感不安，而且，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因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感到愧疚和痛心。

因为他对青少年的教育抱有满腔热情，所以对教育中的这个严重问题，有着特别强烈的反应。这从他文章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但事实上，不只是他，在教育界，在社会上，从领导、教师、学生、家长，以至很多社会人士，对这种现象都感到不满，有各种议论，并且为改变这种状况提出过不少意见和建议。

议论之中最普遍而又突出的就是指责这种教育为“应试教育”，指责地方、学校、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还有的把这种广大学生都想上大学的现象形容为“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统一高考的制度，认为问题都出在“高考的指挥棒”上，而且，全国的高中毕业生都仅凭几份试卷在三天的考试中决定命运，是极不合理的。胡百良同志甚至说：“升学制度不改，考试制度不改，校无宁日，家无宁日，国无宁日。”不过，应该说明，胡百良同志并没有把上述问题只是归因于高考制度，他也特别谈到了作为校长和教师自身的教育思想问题。

针对这种所谓“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教育部门的领导先是提出“要端正教育思想”，但是“端正”了很多年也没有端正过来；同时，不断地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如精简教材，限制给学生留作业的数量和所用时间，三令五申不准乱印各种所谓的“复习资料”、“学习参考资料”和“习题集”等等，但也收效甚微。比这更重要的是还应当提到，在这一个过程中，不论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还是许多学校和教师，都在为此考虑和致力于教育和教学改革，不过，这一个严重地困扰整个教育界、对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胡百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事业的校长——胡百良

良同志甚至说：“中央关于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规定和通知，发了一个又一个，但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同胡百良同志和许多人有同样的感受，并且在离休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单位及包括胡百良同志在内的一些实验学校的校长，共同进行了教育改革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且产生了一些实际效应，即有些建议已经被当时的决策部门所采纳。应当说：这是很值得高兴的，当时确实也感到了一种辛勤劳动获得了有效成果的喜悦。

然而，退出教育舞台以后，近些年来，我从许多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效应非常微弱，只不过是部分地“落实”到一些如课程改革和教学计划之类的书面文件上，与学校的实际教育和教学还有很大的距离。除了少数学校之外，很难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远远改变不了那种普遍地为追求升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倾向。而且，我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看到和听到过的令人慨叹的情况和问题。比如，很多孩子受到学校和家庭的两面夹攻，不但校内的学习负担减轻不了，周末、寒暑假和平时在学校下课以后，还要疲于奔命，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加强班和音乐、美术、体育、外语、数学等等的特长班，或者是请家庭教师给补课，真是陷于苦不堪言的境地。在学习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沉重的压力，以至有些孩子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异。为此，我深感痛心，同时也深感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不，不只是我自己无能为力，我感到，一些学校、教师、家长和教育部门也都是为形势所迫，无能为力，或者是力量甚微，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也正是在这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反思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并以站在“山外”的地位鸟瞰现状，纵观全局，经过不少的夜半深思，我突然明白了，或者说，我看到了：这种追求升学的强烈要求，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阻挡也无法扭转的、遍及全国的、强大的社会潮流。

这个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决策恢复统一高考开始，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规模越来越大，以至遍及全国，深入到家家户户。许许多多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家长投进了这个潮流，千方百计要让孩子进入一个好的甚至最好的幼儿园。而且，从这时开始，就要让孩子学外语、学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学电脑；全力准备着要让孩子能够进入一个好的甚至最好的小学，下一步就是要进入一个好的甚至最好的中学，特别是高中，然后就考大学。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关，此前的一切都是为跨过这一关做准备。跨过这一关，大学毕业以后还要考进研究院，做

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最好是能够出国留学，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里，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再以后，还要做博士后研究……

这就是这一个大潮流总的流程。

当然，这个潮流也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逐步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般只是以考大学为主要目标。很多人觉得能够上了大学，也就达到了最高理想；但是，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人们很快就不以大学毕业为满足了。于是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如前所说的那样，要考研究生，要出国，要继续深造，要攀登新的高峰。

自然，上面所说的只是这个潮流的总的流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从幼儿园开始就卷进这个潮流，因为有些地方还不一定有幼儿园。但是，绝大多数孩子从小学起就卷入了这个潮流。而且，卷进这个潮流，也绝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在这个大潮中“顺潮而上”。相反，因为这是一种亿万人蜂拥而上的潮流，卷进了这个潮流就是卷进了激烈的竞争和持久的拼搏，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在这一个激烈竞争的大潮中，很多学校、教师以至家长在教育和教学上，采取了许多违背我们的教育方针，违背教育和教学规律，甚至违背教育道德的措施和方法，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这已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事例举不胜举，可以说已为众所周知，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说。

现在要思考的是对这一个大潮流，从根本上应该怎样看待？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前面提到过，有一种说法曾广为流行，这就是把这一个大潮流指称为“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现在要问的是：

上大学，究竟是一条阳关道，还是独木桥？

这样一个追求升学、力攀高峰的潮流，究竟是一个铮铮向上的潮流，还是一股滚滚浊流，甚至简直是一股“恶流”。

这样一个潮流是不是只有前面说到过的那许多弊端和不良后果，还是已经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就，并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们在陷入日常实际生活的漩涡当中，是太容易只看到弊端了。跳出漩涡，登楼展望，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就是：

经过了二十多年，在这一个大潮流中，已经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这包括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在国内外获得了博士、硕士、学士学位以及许多虽无学位但学有专长的人才。他们已经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展现出了开拓性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改革的校长——胡百良

的、创造性的才能，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在从二三十岁到四五十岁以至有些六十岁左右的人才，都是在这一个大潮中培养造就出来的。可见不论在这一个大潮中，在考试制度和学校的各种制度上，以及在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上，有多少弊端，但毕竟是有大批的人才脱颖而出，真可以说是“大潮后浪推前浪，不尽人才滚滚来”。

同时，这也就证明了有许多好的学校，许多优秀的校长和教师，能够在一些不利的大环境和风气之下，在自己的学校和教育教学中创造出一种既有很好的学风又有宽松活跃的环境，使许多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南京师大附中和当时的胡百良校长就是这样，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与此同时，还应当说到，有许多学生不论自己的家庭和学校环境怎样，也不论教师如何，由于自己的自觉和奋发图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有许多聪颖的学生，善于学习和思考，有自己的特长，能够超越那一套专为应付考试而采取的不当的教学方法，灵活自如地学习，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并继而登上了文化科学的高峰；也有许多学生就是在那种所谓“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猜题押宝、模拟考试等一整套“大运动量的训练”中，不分昼夜，苦苦地、死死地、规规矩矩地干了出来，升入了高等学府，然后得到了适当发展。

不仅如此，在这二十多年追求升学的大潮中，我国的广大青少年和许多已经通过了这一潮流而进入成年的人，不论他们在这一流潮中是处于怎样被动的地位，甚至厌学，也不论他们是不是能考上大学，以至是不是能考上高中，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已不是数以万计或十万计，而是数以亿计了。不能不说，这也是很大很大的成绩。

还有一点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一个大潮流强烈地冲击了我国原有的死板划一的学校教育制度，非常明显地揭示出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迫切地需要对之进行重大改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突破了一些多年来难以突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僵硬教育制度、办学模式和许多积弊，开创了一些新的制度，建立了一些新的模式，展开了一些新的实验。这些改革虽然开始不久，在短期内很难获得大面积的显著成效，但确实具有划阶段的历史意义和深远意义。由此可见，这一大潮流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已成为进行教育的强大动力，并起了突破性的作用。很多教育工作者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积极地投入了教育和教学改革。

当然，我国的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实际的，这就是培养人才。正是从这个遍及

全国的追求升学的大潮中，暴露出了我们在培养人才中的许多问题，因而这个大潮也就成了促进和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动力。

而且，我国原有的高度统一的刻板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可谓根深蒂固，定型难改。多年来也曾进行过多次的教育教学改革，而且，针对学生的负担过重，从20世纪50年代之初起，几乎每过一两年就提出一次“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对制度本身根本没有触动，也难以触动，学生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掀起如此大规模的追求升学的热潮，对这种制度起了强烈的冲击作用，也就很难使这种教育制度得到根本性的改革。

由此可见，这一个大潮流尽管有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却是一个宏伟的、亿万人奋力学习、力争向上的潮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胡百良同志也正是在这一个大潮流中，被这一大潮流所激发和推动，全身心地投入了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艰难的教育改革的。

“校长的特殊使命”和时代要求

胡百良同志把他的这本书题名为“校长的特殊使命”，是意味深长的。

他没有专门用一章、一节来直接地阐述他作为校长的“特殊使命”是什么，但是他用全书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章讲的都是教育改革。

第一章，“什么是校长的首要任务”，从“当前中学生的苦与乐”到“如何把办好办学方向”，讲的主要就是我们的教育必须要进行改革。

第二章，“基础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从“新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教育的利弊”到“新世纪教育目标的研究”，则进一步讲到了基础教育目标的改革。

第三章，“德育为什么很重要”，讲的是德育的改革。

第四章和第五章，“课程改革是关键”和“分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讲了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难度最大的问题——课程改革。这是胡百良同志在教育改革中紧紧抓住的一个中心问题，很自然，也就是本书的重点。

其他几章，从“教学工作评估的研究”到“重在自身修养”，讲的也都是教育改革以及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

这是很有时代意义的。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改革事业的校长——胡百良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大改革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也处在一个重大改革的时代。但改革是艰巨的，教育改革也非常艰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改革不仅在我国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在世界上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础教育的改革就在许多国家相继展开。特别是在50年代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科学院召开了中小学教育改革讨论会，发表了总结报告，提出对课程结构进行改革的理论，并编写了一系列新的教材。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日本等也对基础教育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自此，教育改革就不断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的改革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把教育改革提到了国策的高度，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或最高的领导机构发动和决策。在美国，里根任总统以后就亲自提出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中小学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了一份报告，题名为《国家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以后，美国的历届总统，包括现任总统布什，都亲自出马，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或目标，甚至在竞选总统之时，就把教育改革当做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并发表纲领性的意见。英国的首相和国会，法国的总统、总理，日本的首相和内阁，都对教育改革做出过重大决定，发表过重要文件，甚至立法。从这些国家的许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和决定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都把教育改革提高到了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明显地将其作为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显然，这就与过去教育改革常常只是由教育部门来提出和进行大不相同。

这就说明，教育改革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其原因就是在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培养人才的教育也就成为一个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奠定基础的根本问题。我国教育的根本动因，如前所说，也就在此。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亲自抓教育工作，对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发表过多次重要指示，并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胡百良同志在他的书中，也阐明了这一点。

教育改革受到如此重视，同时也就说明了，原有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基础教育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了。这不仅是我国如此，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否则，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非常紧迫地要进行教育改革了。

不过，由于原有的教育制度不同，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也就有所不同。从一些主要国家原有的基础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进行改革的情况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恰好相反的类型和发展趋势，简单说：

一种是基础教育非常的“自由化”，国家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更没有统一的教材，从小学就强调从学生的兴趣出发，一个班由一个教师来教，也不分科进行教学，上课的随意性很大，忽视甚至基本上不进行系统的基础知识教学，也没有什么考试制度。中学的课程，很多学校可以说实行的是“全选修”的制度。虽然有些学科是必修的，如本国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等，但这些学科之中又设有难度不同和种类不同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如同一年级的学生学习语文、数学，有的可以选择高难度的，有的选择一般的，有的选择基本的也可以说是最低要求的；同时还可以选择这一学科中的不同种类课程，如语文可以选择阅读、写作、文学或实用语文，等等。要升入高等学校，并没有全国或地方的统一考试，而是根据所要报考的高等学校的专业要求，到一些有权威的（不是国家举办的）考试中心去考试，一般只需要考二三门课程，而且可以这一次考一门，下一次再考另一门。这种类型的基础教育，可以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虽然这两个国家由于对学校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学校是多样化的，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完全如此，但上述情况是最为普遍的，可以代表他们的基础教育的基本模式。这种基础教育制度的优缺点，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暂不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是，近十几年来，这些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向着建立统一的课程标准和考试制度的方向发展。

另一种基础教育是国家有完全统一的学校制度、统一的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升学考试制度。我国原来的基础教育就是这样，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关于这种教育制度的优缺点，胡百良同志在他这本书中的“中国传统教育目标的利弊”和“传统课程的弊端”中，已做了全面的分析。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以及与我国有类似情况的国家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在突破这种完全统一而又死板的模式，向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这样，两类不同的制度正在向着各自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也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但这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又是同一的。这就是两类不同的制度都要取对方之所长，补自身之所短，将集中统一和灵活多样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总结许多国家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条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简单说，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如果完全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那就会使基础教育的质量得不到根本的保证，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

一个将全身心献给教育
改革事业的校长——
胡百良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只有统一性，而且是完全的集中统一，而没有灵活性和多样性，那就不能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同样会产生许多恶果。

但是，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多年来都进行了多次的基础教育改革，从20世纪的后期算起，也已经有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这些国家做过许多研究，制订过许多法令和方案，采取过许多措施，推行过许多改革计划，然而，直到现在，在各个国家，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状态和学业成绩不良等问题，依然相当普遍而又严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说，其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更不要说取得成功了；倒是有不少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以至无法推行。这些事实说明，基础教育的改革实在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基础教育的改革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教育内部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很复杂，并且常常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困难也各有不同。

就我国来说，基础教育的改革有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如：人口众多，基础教育规模庞大，中小学校最多的时候总计约近百万所，学生近两亿人，比美、英、德、法和日本5国的中小學生总数还要多一倍，堪称为基础教育的“超级大国”。那些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规模比我国小得多，有的还不及我国的1/10，尚且困难重重，问题很多，总是办不好。我国要把如此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办好，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再加教育经费少，一些发达国家是钱多学校少，我们是钱少学校多，自然就更加困难了。

从教育内部的原因来说，我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基础教育制度，如前所说，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根深蒂固，定型难改。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前，闭关锁国，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与这不同的教育制度，因而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这种教育制度是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并习以为常。同时这种制度又因为非常的单一化，既便于管理，又便于执行，只要按照那一套完全统一的制度、计划办事，按照那一套完全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材进行教学就是了。这就形成了一种从领导、教师到学生和所有有关人员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和习惯势力。

要突破这种多年形成的传统和习惯势力，要改变这种单一化的制度，不仅有很大阻力，而且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其中一个最为困难的问题，也是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课程改革。胡百良同志全身心投入的也正是这一项改革。